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的誕生及其发展

迪·努·艾地著

D33

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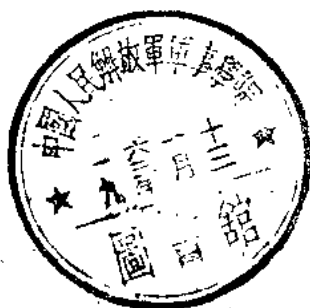
世界知識出版社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的誕生及其发展

迪·努·艾地著

强 明 译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1年·北京

D. N. Aidit
LAHIRNJA, PARTAI KOMUNIS INDONESIA
DAN PERKEMBANGANNJA
Jajasan "Pemburuan"
Djakarta, 1955
根据印度尼西亚“革新社”一九五五年版译出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的诞生及其发展

(印度尼西亚) 迪·努·艾地著

强 明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干面胡同 27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0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 0.12 元

1955 年 12 月第一版 1961 年 9 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印张 1 1/2 · 字数 25,000

统一书号 3903 · 232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成立於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因此，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是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成立三十五週年。

三十五年前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誕生，是印度尼西亞工人階級政黨的誕生。這個黨的發展是印度尼西亞工人階級領導農民和其他人民羣衆進行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英勇鬥爭及為了推翻反動政權並建立以大多數人民聯盟即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政權的鬥爭的歷史發展。唯有這樣的人民政權，才有可能在未來實現社會主義的印度尼西亞。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三十五年的歷史，並不是平靜的與和平的歷史，而是經歷了許多動盪、許多危險、許多錯誤和許多犧牲的歷史。但也是英雄的、興奮的、有許多教訓和成功的歷史。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三十五年來的發展可以劃分如下：

(一) 黨的成立和反抗第一次白色恐怖的鬥爭 (一九二〇年——一九二六年)。

(二) 二十年地下鬥爭和反法西斯戰綫 (一九二六年——一九四五年)。

(三) 八月革命和反抗第二次白色恐怖的鬥爭 (一九四五年——一九五一年)。

(四) 民族統一戰綫的擴大和黨的建設 (一九五一年——……)。

(一) 党的成立和反抗第一次白色恐怖的鬥爭

(一九二〇年——一九二六年)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是印度尼西亞工人運動和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相結合的產物。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在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成立並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而是客觀的事件。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是在帝國主義時代，是在印度尼西亞有了工人階級，成立了工會及社會民主聯盟以及在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後誕生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是適時誕生的時代產兒。

斯大林在其所著的“論列寧主義基礎”一書中的說明使我們明瞭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誕生乃是時代的必然性。

“帝國主義就是對極廣闊殖民地和依賴國內十多萬萬居民施行最橫暴的剝削與最無人道的壓迫。榨取額外利潤，就是這種剝削與壓迫底目的。可是，帝國主義在剝削這些國家時，不得不在那裏敷設鐵路，設立工廠，建立工商業中心。無產者階級的出現，本地知識界的產生，民族意識的覺醒，解放運動的加強，就是這種‘政策’不可避免的結果。所有一切而無例外的殖民地和依賴國革命運動之加強，就是顯明證明這一點。

“這個情況對於無產階級是重要的，因為這個情況根本破壞資本主義底障地，把殖民地和依賴國由帝國主義底後備力量變為無產階級革命底後備力量”。

斯大林在上面所說的，是完全符合於二十世紀初期在印度尼西亞所發生的情況。由於二十世紀初期在印度尼西亞的投資的迅速增加，殖民資本不得不在印度尼西亞經濟生活中實行巨大的改變。不得不建立原料加工工業如糖和橡膠工業。不得不

建築碼頭、鐵路和修理廠。因此，雖然帝國主義努力保持封建關係，但也不能夠防止資本主義傾向滲入到印度尼西亞民族中去。因此，印度尼西亞社會中出現了新的階級，其中包括無產階級。這形成了印度尼西亞獨立鬥爭的新的基礎，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就是在这个新的基礎上成立的。沒有組織的和不斷遭到失敗的農民暴動，現在已為有組織的並領導農民及其他革命階級的無產階級鬥爭所代替。

關於在印度尼西亞共產黨誕生之前，先成立工會和“印度尼西亞社會民主聯盟”這點，可作如下的敘述：一九〇五年成立了一個鐵路工會，名為“國家鐵路工會”。一九〇八年成立了“鐵路電車工會”，這是一個戰鬥性的鐵路工會。但是，印度尼西亞工人階級的覺醒的提高，已經要求不僅僅局限於工會鬥爭的組織。一九一四年五月在三寶壟成立了“印度尼西亞社會民主聯盟”，這是一個集合了印度尼西亞和荷蘭的革命知識分子，為了在印度尼西亞工人和人民中間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組織。“印度尼西亞社會民主聯盟”於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改組為印度尼西亞共產黨。

關於一九一七年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如何推動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成立，我只想引用毛澤東同志的話如下：

“十月革命一聲砲响，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成立表明了印度尼西亞進步分子在迎接偉大的十月革命砲声並不落人後。換句話說，印度尼西亞進步分子和革命的印度尼西亞人民大眾及時地加強了新的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綫。因此，爭取印度尼西亞獨立的鬥爭成為了全世界無產階級粉碎資本主義的鬥爭的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

關於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人的任務，列寧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對東方各民族共產主義者的號召中，已經說清楚了。

列寧說：“在你們面前擺着一個任務，這個任務從前在全世界共產黨員面前是沒有提出過的，這個任務就是：依靠一般共產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你們在應用於歐洲各國所沒有的獨特條件時，須要善於把這個理論和實踐應用於這樣的條件，即農民是主要羣眾，所要解決的鬥爭任務不是反對資本而是反對中世紀的殘餘。”

列寧的這一號召說明了東方的共產主義者，也包括印度尼西亞的共產主義者，不僅必須依靠“一般共產主義的理論和實踐”，而且也要使自己適應於“歐洲各國所沒有的獨特條件”，列寧在這裏所指的獨特條件就是農民。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是新的階級即必須擔負起領導者的責任的工人階級的政黨。為什麼工人階級必須擔負領導者的責任呢？印度尼西亞工人階級雖然數量不多（約有六百萬人，是工資勞動者，其中約有五十萬是現代工人或無產階級），但他與農民是有區別的，因為工人階級代表新的生產力；工人階級也不同于資產階級，因為工人階級擁有堅決的鬥爭意志，因為這一階級受到三種壓迫，即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壓迫。由於它的工作場所，工人階級是最有紀律的階級，由於沒有生產資料，工人階級是最堅決的和大公無私的階級。因此，工人階級雖然數量不多，但必須擔負領導的責任。

後來以反對荷蘭帝國主義的戰鬥者而著稱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成立，不僅受到印度尼西亞工人和農民而且也受到其他人民階層的熱烈歡迎。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同樣獲得軍隊和水兵羣眾的歡迎。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發展得非常迅速。

不久，共產黨人就在“工人運動聯盟”中具有很大的影響，“工人運動聯盟”於一九二〇年八月在三寶壟召開代表大會，有二十二個工會代表參加，代表七萬二千會員。共產黨人首先是通過戰鬥性的“鐵路電車工會”去發生影響。這是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在工人運動中的優良傳統的開始。

一九二〇年在爪哇和蘇門答臘發生了各種罷工，這些罷工一般是以工人的勝利而結束。這些勝利給了工人以鬥爭精神和鼓舞；教育工人認識了組織和紀律的重要性，並向工人和一般人民揭露了殖民勞工條例和殖民政府的腐敗。

工人運動所獲得的進展，使政府感到恐懼，尤其使它恐懼的是，共產黨的勢力日益強大。政府設法去影響“回教聯盟”，並加深共產黨人和“回教聯盟”之間的矛盾。在“工人運動聯盟”內部的改良主義派獲得荷蘭政府的支持，因而加深了革命派和改良主義派之間的矛盾。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在日惹的哥達克特召開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代表大會的記載稱：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有三十八個黨委，擁有一千一百四十個黨員，而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人民同盟”擁有四十六個分支、三萬一千個盟員。

這證明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即使在荷蘭殖民政府的巨大阻礙之下仍獲得迅速的發展。“人民同盟”的迅速發展，顯示了農民對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熱烈歡迎，因為“人民同盟”的成員主要是農民。

但是，黨並沒有能夠鞏固羣眾對黨的廣泛的同情以及較多的黨員人數。黨確曾在喚醒人民的反對荷蘭帝國主義的精神方面作了重要的工作，但是，黨沒有能力來鞏固它所已經獲得的成就。

當時印度尼西亞共產黨領袖的基本錯誤，就是他們成了左

傾口号的犧牲品，不努力說明情况，企圖一舉解決所有的問題，如消滅封建主義，擺脫荷蘭統治，粉碎所有的帝國主義者，打倒反動政府，消滅富農，消滅民族資產階級。自然的，這一切就導致真正的敵人和可能成為敵人的分子團結起來反對黨。這使黨本身陷於孤立並大大地削弱了黨。黨沒有充分地引導其黨員去關心同工人、農民及勞動知識分子的日常需要有關的細小和普通的實際工作，其實只有在這裏，只有在这种工作中，黨才能把廣大的勞動人民羣眾團結在黨的周圍。當然，這種工作並不是稱心如意的，不是沒有困難的。但是，要密切黨同勞動人民羣眾的聯繫，別的道路是沒有的。

正如一九五四年三月，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總報告中所說的，在第一個時期，

“黨對於聯合民族資產階級的必要性還是完全無知，黨提出的口號是‘立即實現社會主義’、‘印度尼西亞蘇維埃’和‘無產階級專政’。斯大林同志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對東方大學學生的演說中正確地並中肯地批評了黨的這種‘左’傾偏向，他說：‘這是“左”的偏向，它包含着與廣大羣眾脫離並把共產黨變成宗派的危險。’”

黨犯上了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的毛病，這顯然已使黨變成一個宗派，使黨從廣大的人民羣眾中孤立起來，並使殘酷的殖民政府容易來粉碎黨。斯大林確切地說：“與這個偏向作堅決的鬥爭，是東方殖民地和附屬國培養真正革命幹部的必要條件。”斯大林同志以上的話的正確性，在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我們深深地体会到。

至於建黨的工作，當時黨的領導還不可能真正地去注意它。黨內沒有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教育，機會主義分子潛入並控制了黨的領導機構，黨還不懂得批評和自我批評以及集體

領導的方法。这个事实使党在理論上、政治上和組織上都很軟弱。

在党脱离羣众和党的組織还非常軟弱的情況下，印度尼西亞的危机愈益加深，人民的生活日益降低，沒有組織起來的人民对政府工具進行的反抗也愈益加多。在這種情況之下，荷蘭殖民政府不断地進行挑畔，即解僱罷工者、逮捕農民、封閉印度尼西亞共產党或“人民同盟”舉办的學校，禁止工人的報紙出版、逮捕工人領袖等等。特別是為了对付農民，荷蘭組織了各種恐怖集團，如勃良安的“綠色同盟”。這一切導致了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在爪哇和一九二七年年初在蘇門答臘的人民起義的爆發。起義爆發後，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即挺身而出，以便盡力領導起義。印度尼西亞共產党迅速出來領導這次人民起義的態度，乃是正確的。

起義進行期間以及起義之後，党的各種弱點則顯得特別突出。例如党的領導對於起義沒有一致的意見，对保衛党的領袖和幹部的工作毫無準備，各地方之間的行動沒有相互配合，城鄉之間的鬥爭沒有相互联系等等。除此之外，還有陳馬六甲這一類人（當時是印度尼西亞共產党領袖之一），他在起義開始之前沒有採取明確的措施，而在起義爆發之後却責難起義不對。尤有甚者，正當印度尼西亞共產党面對着殖民政府及其走狗的白色恐怖的時候，他和他的小集團竟公開地實行了托洛茨基的作法，建立新的政党——“印度尼西亞共和党”。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內部的分裂使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原來已經困難的工作更加困難起來，而且便利於荷蘭在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內部以及在一般的民族獨立運動內部實現其分裂政策。

數以千計的印度尼西亞共產党黨員和工作人員被追逐和判刑，其中有的被絞死。有許多人被流放到伊里安利事的沼澤地

帶。只有幾個印度尼西亞共產黨領袖能够安全地逃往國外，其中有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慕梭同志。

許多印度尼西亞共產黨黨員和工作人員，雖然他們參加黨的時間並不長，但其中大多數都具有強的党性。他們毫不後悔，含笑地走向絞架與接受監禁或流放的判決。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堅決反對荷蘭帝國主義的政策以及印度尼西亞共產黨黨員與工作人員面對當時的殖民政府所表現的英勇態度，提高了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在真正爭取獨立的戰士和印度尼西亞人民中間的政治威信。這使印度尼西亞被壓迫的人民增加了对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信仰和愛戴。

一九二六年的起義，以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和革命的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失敗而告結束。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不能够被忘却的，這就是這次起義向印度尼西亞人民指出了：荷蘭是可以被弄得手足無措的，殖民統治是可以被搖撼的，這種統治不是千古不變的統治。因此，一九二六年起義對於提高印度尼西亞人民的政治覺悟有着特別重大的意義。

由上述種種得出的結論是：印度尼西亞共產黨還不善於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般原理和印度尼西亞革命實踐結合起來，因為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領導還沒有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還沒有了解印度尼西亞的歷史和社會情況以及印度尼西亞革命的特點和印度尼西亞革命的規律。其結果便是：黨不懂得印度尼西亞人民客觀的基本要求，即消滅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並實現民族獨立、民主和自由的要求。此外，黨的領導沒有認識到，為了實現上述要求，就必須建立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包括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廣泛的統一戰綫。由於不了解這一切問題，當時黨的領導就產生了錯誤的想法，以為“農民在一切鬥爭中是不能

被信任的”，以为“中間階層和知識分子已經成为資本家的工具”，以为“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必須反对一切資本主义”，以为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的口号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建立印度尼西亞蘇維埃”、“实行無產階級專政”等等。

虽然，在这个時期中，党的組織是發展了，但沒有把党鞏固起來。黨員和党的幹部在理論和政治方面沒有加強，他們沒有獲得必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沒有能够使党内積極分子成为党的骨幹。在面對着第一次挑釁和白色恐怖的危急情況下，在党的領導中掌握實权的分子未能領導全党來挽救党。

總而言之，在第一個時期中，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在兩個基本問題上沒有經驗，即：（一）統一戰綫問題，和（二）建党問題。

（二）二十年地下鬥爭和反法西斯戰綫

（一九二六年——一九四五年）

一九二六年起義之後，印度尼西亞共產党便被荷蘭殖民政府宣佈為非法。鑒於印度尼西亞共產党不能夠再從事合法工作，又由於它被左的口号所吸引，因此，原在印度尼西亞共產党領導下的革命羣眾便轉而歡迎左翼民族主義政党，即在一九二七年成立的“印度尼西亞國民黨”。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的幹部和黨員除了參加各種羣眾團體外，還有許多參加了這個左翼政党。但是，由於印度尼西亞共產党還沒有建立新的中央領導，當時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幹部和黨員的活動沒有獲得良好的領導。

自從一九二六年起義失敗以後，印度尼西亞的民族獨立運動開始進入低潮。顯然，荷蘭殖民政府不僅鎮壓印度尼西亞共產党以及在印度尼西亞共產党領導下的革命的羣眾組織，而且

以实行各种挑衅、阻撓它的一切活動和流放它的領袖等措施來鎮壓“印度尼西亞國民黨”。

当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和左翼民族政黨被殖民政府打擊的時候，在“印度尼西亞民族黨”內擁有基本力量的右翼民族主義者便趁機加強他們和荷蘭政府的合作。他們集中力量從事他們所謂“積極的”工作，即指建立合作社、學校、商會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右翼民族主義者在若干地區甚至在鄉村中擴展了他們的工作。荷蘭樂於稱他們為“健康的民族主義者”，因為他們的活動和荷蘭政府的利益沒有衝突，也正因此，荷蘭政府給予他們以必要的方便。

但是，獨立運動的低潮為時不長。世界危機及隨之而來的廣大人民的貧困、緊縮開支、增稅、集體解雇等等，阻礙了右翼民族主義者和荷蘭政府間的穩當的合作。來自工人階級、農民和知識分子的急進的呼聲越來越响亮。這個危機時期通稱為“不景氣時期”，或如印度尼西亞農民所稱的“困難時期”。

在一九三三年二月間，猶如晴天霹靂，在“七省號”軍艦上發生了水兵暴動，這個暴動受到許多國家的工人的熱烈歡呼。這一事件對於重新鼓舞印度尼西亞人民反抗荷蘭殖民統治的精神是重要的。後來在一九三三年的七月，爪哇鐵路工人威脅罷工，荷蘭政府在印度尼西亞改良主義分子的幫助下好容易才阻止了它的爆發。

在各個地區發生了人民的反抗鬥爭，大多數是個人的活動，這證明反抗的鬥志在增長着。但由於印度尼西亞共產黨還未能良好地重建其中央領導，使荷蘭對工人階級的鬥爭和人民的反抗的鎮壓顯得輕而易舉。

自從一九三二年以來，從事地下工作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以十八條綱領為其行動的基礎，即：印度尼西亞完全獨立，立即

釋放所有政治犯並取消利享集中營，保障罷工權利和示威遊行權利，同工同酬，反對各種降低工資的措施，由政府救濟失業者，土地歸農民並沒收帝國主義者、地主和高利貸者的土地，反對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等等。這個綱領是在法西斯分子（國家社會主義者）在德國當權之前制訂的。

在一九三三年三月間，德國法西斯分子在希特勒領導下登台。斯大林同志在聯共（布）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指出法西斯主義在德國的勝利時說：

“……不僅要把法西斯主義在德國的勝利看作是工人階級力量軟弱的表現，看作是替法西斯主義當清道夫的社會民主黨叛變工人階級的結果。同時還須把它看作是資產階級力量軟弱的表現，它表明資產階級已不能用國會制的和資產階級民主制的舊方法來實行統治，所以不得不在對內政策上採取恐怖的管理方法；它表明資產階級已不能用和平對外政策來找到擺脫現狀的出路，所以不得不採用戰爭的政策。”

換言之，為了對付深重的經濟危機，為了對付尖銳化的資本主義總危機和更加革命化的勞動人民羣眾，執政的資產階級便向法西斯主義尋求保護。

帝國主義者利用法西斯主義把全部危機的負擔轉嫁到勞動人民肩上。他們奴役弱小民族、加緊殖民壓迫以及發動新戰爭來重新瓜分世界，力圖以此來解決市場問題。他們摧殘工人和農民的革命運動，並向世界無產階級堡壘蘇聯發動軍事進攻，想以此來阻撓革命力量的成長。

季米特洛夫同志在一九三五年八月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提到：“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不僅只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這是野蠻殘忍的民族侵略主義。這是強盜政治的政體，它誣害和拷打工人階級以及革命的農民、小資產階級和知

識分子。這是中世紀的暴虐無道的野蛮制度。這是退性侵略其他民族及國家的制度。”

由於法西斯分子在德國的當政所引起的國際形勢的變化，對印度尼西亞政局的影響是重大的。蘇聯把鬥爭首先指向建立和平陣綫，以反對侵略國家。一九三五年八月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上也通過了一項綱領，目的是在工人運動中建立統一戰綫，建立人民陣綫和人民政府，以反對戰爭和法西斯主義。這就意味着在共產黨人和民主的資產階級分子之間實行更廣泛的合作的必要性。

為了傳達這個反法西斯的政治路綫，慕梭同志於一九三五年從國外返回印度尼西亞。慕梭同志不僅僅傳達這個新的政治路綫，他同時成功地重新把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幹部聚集起來，並建立了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新的中央委員會。但是，慕梭同志在印度尼西亞不能久留，他必須立即再度離開印度尼西亞，因為荷蘭政府已經發覺了他的行踪。這樣一來，慕梭同志沒有機會為黨的建設作很多工作，以致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在沒有強有力的方針的條件下來建立列寧—斯大林型的黨。

在若干左翼民族主義者和若干共產黨人的倡議下，成立了合法的人民團體，稱為“印度尼西亞人民運動黨”。“印度尼西亞人民運動黨”的成立，給予民族獨立鬥爭和反法西斯運動以新的力量。在“印度尼西亞人民運動黨”及其他民主政黨的建議下，組成了“印度尼西亞政治聯盟”，也就是為在印度尼西亞建立議會，並和荷蘭政府商議共同反抗法西斯主義、首先是威脅亞洲人民的日本法西斯主義的各個黨派的統一戰綫。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印度尼西亞政治聯盟”在雅加達召開印度尼西亞人民代表大會，非政黨的組織如工會、社會團體等也出席了這個大會，在該代表大會上議會問題

成為首要的議程。在印度尼西亞建立議會被代表大會視為重要問題，作為在對付法西斯主義危險中鼓舞人民力量的對策。後來，該代表大會的領導者決定將印度尼西亞人民代表大會改為被認為代表印度尼西亞全體人民的印度尼西亞人民會議。這是成立一個議會的準備。但是，荷蘭政府對這一事實置之不理。“印度尼西亞政治聯盟”和印度尼西亞人民會議向荷蘭提出合作以對付日本法西斯的侵犯的提議，到了一九四二年三月九日荷蘭投降日本為止，一直不被荷蘭所理睬。

沒有獲得廣大人民羣眾的支持的各政黨與團體的領袖之間的廣泛合作，已使爭取設立議會的要求遭到失敗，已使壓迫荷蘭政府積極與印度尼西亞人民一道進行反法西斯鬥爭的印度尼西亞人民運動遭到失敗。這是因為印度尼西亞共產黨還沒有形成為一個在羣眾中生根的能夠團結和動員廣大人民羣眾，首先是工人和農民的政黨。“印度尼西亞政治聯盟”和“印度尼西亞人民代表會議”作出各項決議但從未發動羣眾鬥爭如示威遊行或其他鬥爭來配合，作為對荷蘭殖民政府施加的有意義的壓力。

由於在印度尼西亞的反法西斯陣綫不夠強大，所以日本軍隊能夠沒有遭到抵抗而佔領印度尼西亞，不僅沒有遭到荷蘭軍隊的抵抗，而且也沒有遭到人民運動的抵抗。在面臨日本法西斯時，人民不論是物質上或精神上的準備都不夠。其結果是，在抵抗日本法西斯的初期印度尼西亞共產黨處於孤立的地位。在日本佔領初期，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和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重要幹部有許多被日本逮捕，其中也有被處死刑的。

在日本佔領之後數個月，印度尼西亞人民根據本身的經驗才認識到日本法西斯的殘暴與獸行。在人民中間，反對日本的情緒越來越普遍，反法西斯的組織在各地成長起來，而且有許多

是在印度尼西亞共產黨黨員和幹部的領導下。當時，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是在日本暗探追緝之下過生活的。日本對共產黨人的追捕是一刻也沒有停止過。由於組織不嚴密，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重要幹部經常為日本所逮捕。但是，即使如此，日本的殘暴也不能壓下人民的反抗。到處發生暴動，如新雅巴那、南安由與三寶壟等地，而且在“保衛祖國軍”中間也發生暴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諫義里州勿里達的“保衛祖國軍”的暴動。

關於日本佔領印度尼西亞之前和之後的反法西斯陣綫的問題，在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總報告中曾這樣說：

“反法西斯陣綫（日本佔領之前——迪·努·艾地）不僅成功地吸引了民族資產階級，而且也吸引了部分的買辦資產階級成為反日陣綫的後備力量。但是，自從日本軍隊佔領印度尼西亞之後，大部分民族資產階級以及可以說整個買辦資產階級採取了與日本合作的政策。民族資產階級當看到人民反日力量不怎麼強大之後，並幻想日本將給印度尼西亞以‘獨立’，他們便實行與日本合作的政策。”

但是由於反日情緒高漲，特別是在農民與軍隊的暴動事件發生之後，日本的走狗對其主子效忠的程度就越來越減退。最後，有不少高踞要職的人士與地下的反日運動發生聯繫。印度尼西亞的大學生和學生在反抗日本的鬥爭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這一切的結論是，雖然人民的反日和反荷情緒高漲，雖然由於黨執行堅定的反法西斯政策而享有很高的政治威信，雖然國內外的形勢對於發動革命非常有利，但是黨所面對的一九四五年八月爆發的革命的任務是非常繁重的，因為黨沒有把它在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的關於統一戰綫的經驗總結起來，而且在建